

论舆论监督、媒体审判与刑事司法独立关系

刘春园^{*}

〔摘要〕随着民众参与司法之理念深入人心,媒体对刑事案件报道的透明性增强,一批具有鲜明特点的典型案例群出现在刑法理论研究视野,每一个案均从不同角度展现着公众舆论监督与刑事司法独立性之间的交织与博弈。基于本质属性的相异,舆论监督与刑事司法独立之冲突由来已久,而二者均具有合宪性与合理性依据,良好的制度设计应当在二者之间保持合理张力。通过理论与实务层面的探讨,有必要以促进司法公正为契合点,展现舆论监督的异化过程,归纳媒体审判的形成原因,并于该基础上对舆论监督的原则、监督角色的定位、监督主体的自律等方面提出对策,对司法独立原则的真正含义、司法独立原则的程序价值作出剖析,继而设计出二者之间良性互动的制度框架。

〔关键词〕刑事司法独立;舆论监督;媒体审判

舆论导向影响司法独立的状况具有客观性。一方面,舆论之所以能够对司法独立性产生影响,大致来源于两个层次的原因。首先,人类具有动物性,是丰沛情感与复杂思维的载体,作为刑事司法案件的侦查者、检控者、审判者,对于外界的舆论造势不可能无动于衷,继而在各项司法活动中不免会受到舆论倾向的影响,司法行为被打上舆论裹挟的烙印。其次,司法活动作为一个国家公平正义价值体现之载体,不可能不为公众舆论所关注与监督,此亦为考察司法社会效果的基础性标准之一。另一方面,“对未审结案件的报道,给法官和证人造成压力,传媒审判可能产生的‘预断’以及‘偏见’,会影响法院在审判时对事实的认定。”^①正是基于人类的自然属性与社会的政治属性,当代文明国家必须设置客观制度屏障,以期最大限度地排除舆论环境对司法独立性的影响。

一、舆论监督的本质内涵与发展轨迹

刑事司法领域,公民将私力救济权让渡给国家,却保留了对国家行使公权力的监督权,此乃刑事司法独立与舆论监督之间的本质关系。根据舆论监督与刑事司法独立的本质内涵,我们应当同时尊重言论自由与司法独立这两种基本价值,前提是辨识二者不同的作用领域,厘清二者的效力区域、冲突区域。探讨刑事司法独立性的本质,在司法独立的程序化价值与舆论监督所追求的实体正义之间寻

^{*}法学博士,山西大学法学院讲师,030006。

^①苏力:《关于抗辩制改革》,《法学研究》1995年第4期。

找到平衡点,是合理的制度设计首先需要解决的逻辑前提。根据我国《宪法》第35条与第41条,公民具有“言论自由”与“对公权力的批评与建议”的权利,这是舆论监督刑事司法的基本效力来源;党的十三大报告中,正式提出“舆论监督”公共事务,成为与“群众监督、法律监督”并行不悖的治国理政途径,此乃舆论监督刑事司法的基本政策来源。由此,作为继立法权、司法权、行政权之后的“第四种权力”,^①舆论监督具有法律与政治层面之双重正当性,对实现社会公平正义具有全面意义。

粗略考察社会发展史,舆论监督之实践自原始社会即已形成,司法独立之理念却是社会步入三权分立政治模式后始得萌发。公众事务运行过程中,鉴于公共政策运作前提与施加对象的特殊性,作为公众意愿与诉求载体的“民意”以公意、众意等形式呈现,扮演着至关重要的角色,成为公共政策制定的原点与适用的终点。其运作空间不仅覆盖着对规则、政策执行过程的监督评价,也包含着对各项规则、政策制定过程的影响。合格的国家管理者、政权执掌者,亦深谙舆论导向在政治活动中关键、特殊之地位,或者谨慎引导、借势顺应“民意导向”,或者妥善利用其设置、排除活动障碍,客观意义上推动社会有序发展。当然,公共政策中所探讨的“民意”具有多元化特征,是特定主体基于特有价值取向对特定时期产生的社会现象所抱有的基本态度,公共政策在制定时,应尽可能全面地搜集民意样本,媒体即为有效渠道之一。了解舆论监督实践与司法独立理念的产生背景与运作环境之后,可以得出以下结论:政治社会中,二者之间的矛盾性天然存在,舆论监督作为基本民意之反馈渠道,很难为其他客观工具所代替;同时,二者之间亦具有价值共同性,“司法审判追求法律上的公正,网络舆论监督追求道德上的公正,两者皆服务于实现社会正义的目标”^②。追求社会正义、维护个体自由、限制公权力的膨胀等共同价值理念决定了二者之间的兼容性与互补性。

我国舆论监督司法之发展,大致历经了以下四个阶段。^③第一,传统媒体时代。十一届三中全会后,信息化与市场化促使纸媒监督功能凸显。刑事司法领域,涉及“双城堡火车站野蛮装卸事件”、“大兴安岭火灾事件”等报道所涉及公职人员犯罪案件共计476件,以纸媒为代表的舆论监督锋芒毕露。第二,视听媒体时代。20世纪90年代,纸媒向视听媒体过渡,舆论监督刑事司法的渠道主要借助官媒,笼罩着浓厚的行政色彩,监督对象也多数为公权力与公务人员。第三,网络媒体时代。21世纪初,网络媒体进入试水期,具有向受众传播与接受信息反馈双向属性,突破了传统媒体由于技术障碍导致的时间、空间之单维度限制,对刑事司法的舆论监督显现出前所未有的顽强性与深入性。第四,自媒体时代。近十年来,无线网络技术与移动通讯设备的成功对接,以“微博”、“微信”为代表的自媒体成为网络传播最活跃的载体。传统媒体与网络媒体对信息的垄断被打破,受众随时随地通过移动通讯设备发布信息,通过评论与转帖等围观效应集结为舆情,自媒体所具有的交互性、开放性与聚集性特征将舆论监督社会事务的效力发挥致尽,全方位对社会事务进行干预,其中当然亦包括对各类刑事案件的关注与评论,由于缺乏完善的监控机制与自律素质,自媒体信息发布之门槛限制越来越低,真实性也难以预测、甄别、控制。

二、舆论监督司法之异化与成因

当前,舆论监督的传播途径与运作机制随着媒介技术的更新,逐渐演变为代表阶层多样化态度与情绪的宣泄阀门;关涉刑事司法领域,其实践亦滑入危险的“媒体审判”边缘。一方面,网媒平台的平等性为民众提供了表述个体态度与情绪的理想空间,舆情多元化;另一方面,网络平台具有隐匿性,汇聚析出的舆情信息不同程度地被异化。以全国范围内具有较大影响的刑事案件为研究脚本,自媒体

①景汉朝:《传媒监督与司法审判的冲突与契合》,《现代法学》2002年第1期。

②张志铭:《传媒与司法的关系》,《中外法学》2000年第1期。

③陈建云、吴淑慧:《舆论监督三十年变革》,《当代传播》2009年第4期。

所发布的案件信息,交互性言辞在缺乏全面性甚至被刻意裁剪的虚假陈述的引导下,具有较大的非理性,而由此集结的舆论导向亦严重偏离客观事实。此外,数十年来,我国传统媒体具有官方性质,“中国受众素来都有‘把报纸(自然也包括电视等媒介)当文件读’的习惯”,^①自媒体语境下,民众依然沿袭上述对官媒信息的信任模式,以至于当某些自媒体作者针对未审结敏感案件发表非专业点评时,虽然仅代表个体意见,囿于官方信息披露之不及时,民众无法自行发掘案件事实,于是选择将自己的态度直接嫁接于前述“非专业解读”基础之上,导致舆论监督司法之功能逐渐异化。

1. 舆论监督之异化。舆论监督变异为“媒体审判”后,所承载的负面影响体现在如下方面。首先,干扰司法独立、解构司法权能。制度体系层面而言,司法独立是司法公正之前提,公安司法机关独立处理刑事案件,目的在于保证刑事案件审理过程与裁判结果的公平与公正。刑事案件的侦查、提起公诉、审判是专业化较强的活动,司法运作必须严格遵照法定程序与实体规则谨慎进行。媒体审判环境下,舆论监督超越界限,演绎为民意对刑事司法程序的无序侵入,继而形成舆论定势,对于未决案件抢先定性,必将对其后进行的一系列司法活动产生无形压力与影响。以“邢永瑞等五人涉嫌玩忽职守案”为例,民间舆论重心倾斜,侦查机关谨慎应对,即便如此,较大的压力还是直接导致司法程序失范:一方面,侦查机关宣布立案,并对犯罪嫌疑人采取强制措施,却未在立案同时向犯罪嫌疑人近亲属、辩护人告知涉嫌罪名;另一方面,侦查机关批准受害人委托代理人提前介入司法程序,并参与立案阶段包括法医鉴定等系列侦查活动。可以看到,面对强大的舆论集结,侦查机关的行为违背了刑事诉讼法律相关规定,导致刑事司法角色与权能错位,司法机关执法权能弱化与被解构。其次,违背罪刑法定原则、亵渎司法公正。司法功能层面而言,媒介审判的最根本危害在于其对刑法原则的侵蚀与司法公正的破坏。根据我国《宪法》《刑法》与《刑事诉讼法》之规定,必须严格适用罪刑法定原则与无罪推定原则。各类媒体在案件审结前做出倾向于案件一方当事人的推测与定性,明显侵犯了所有当事人受到公平审判之权利。以“王文军涉嫌故意伤害致死、滥用职权案”为例,案件尚未侦查完毕之前,以某报刊为主的媒体即违背新闻报道客观性、中立性原则,通过倾向性报道与评论对被告进行有罪推定,以片面事实引导民间舆论集结,为检察院侦查、公诉与法庭审理保持独立性设置较强障碍,以至于该案一审休庭后,经最高人民法院批准,历经四次延期,至今未能做出判决。第三,剥夺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受害者基本人权。每一桩引起社会公众关注的刑事案件的背后,均蕴含着多角度博弈。媒体作者通常喜欢通过集中披露涉案者生活、家庭、教育、职业背景等,在公众心目中雕塑或贬或褒之当事人形象,造成舆论冲击波;一旦犯罪嫌疑人(被告)被贴上社会化标签,极易引起公众做出超越案件事实范围的负面评价。令人费解的是,做出该种违法行为者大多是接受当事人委托、具有法律专业知识的辩护律师与代理律师。例如“李某某强奸案”属于双重法定不公开审理案件,一则未成年人涉嫌犯罪,二则被告人以强奸罪名被提起公诉。被告辩护人却于案件开庭之前夕通过网络曝光辩护词全文,其中涉及多项受害人隐私等不得向公众披露的事实,严重违反了刑事诉讼法律与律师执业纪律之规定。

2. 媒体审判之成因。从上述案例可以看到,媒体审判是舆论监督与司法独立博弈平衡状态中的不和谐因素,必须从中发掘出形成原因,并予以控制、纠正。综合我国刑事司法环境考察,媒介审判的产生原因包括如下方面。首先,从法律法规与制度设置考虑,目前关涉司法独立与舆论监督的理论研究与制度设置均未达到成熟程度,突出表现为二者各自作用之领域界限模糊,整体处于失范失衡状态,导致以媒介审判假监督之名频越红线。究竟何为舆论监督干涉司法独立?何为司法独立压制舆论监督?认定标准目前为止并未颁布,也未有任何立法、司法解释或者指导性案例可供参考。通过网络言论干扰司法独立之行为屡见不鲜,实施者(无论是单位还是个人)鲜有受到刑事制裁、行政处分

^①顾培东:《论对司法的传媒监督》,《法学研究》1999年第6期。

或者承担民事责任之先例,仅有数例针对涉案律师进行的律协业内处罚。该种立法与司法上的双重空白状态,事实上认可并纵容了针对刑事案件发表不负责任言论之行为,且愈演愈烈。其次,从舆论监督与司法独立的主体模式考察,媒介审判愈演愈烈的成因包括两个方面。一是媒体市场化色彩日益厚重,媒介产品商品化特征被无限放大,媒体弱化社会责任感,不惜抛却职业伦理与底线,渲染片面信息、隐瞒客观事实,引导舆论干涉司法独立。二是司法独立原则本身还仅停留在观念层面,并未切实落实到司法实务操作中。考察当今国内外刑事司法领域,司法独立之理念已经获取各国法学理论界的广泛认可,于司法实务领域却仍然是一个同时面临着希望与尴尬的空白地带。该种现实状况下,无论是司法机构的独立还是司法工作者的人格独立均难以完全实现。司法机构独立层面,公、检、法机构财政拨款与人事调动均须经由地方党委组织部门批准,难以独立。司法人员人格独立层面,由于片面强调以社会效果作为评价标准来考核侦查、检察、审判工作业绩,导致刑事司法工作人员难以根据法律与事实作出专业、理性的评估与判断,往往为“汹涌民意”所裹挟,在权力机关与行政部门的干预与压力下采取妥协性措施。第三,从司法公信力状况层面分析,案件信息缺乏透明度的操作惯例,引起公众对司法公正的广泛质疑。我国司法部门改革的触角并未深入信息公开化领域,也未能建立起即时、高效的新闻发布制度。随着法律与民主意识的提高,公众对社会事务参与热情与日俱增,对于某些引起社会高度关注的刑事案件,知情权无法通过正常渠道得以满足,必然会寻求其他途径,这就给媒体审判提供了运作土壤。另一方面,为了扭转司法公信力薄弱的被动局面,我国刑事案件价值取向调整,强调办案达到“法律效果与社会效果的统一”;司法实务中,法律效果甚至往往还要让位于社会效果,“民意”之重要性日益提高,以至于某些法院在审理公众关注度较高的案件时,很难不迎合“民意”,放弃原本应坚决维护的司法独立原则。第四,从法律文化环境观察,对相同事实的法律评价与道德评价存在着冲突。任何一个国家,刑事司法是启动公权恢复社会正义的终局性救济方式,这一过程具有专业性、技术性、程序性的特点,要保证公正价值适用每一位社会公民,必须从程序与实体两个方面推进。与此相对应,我国传统文明孕育出重实体公正、轻程序正义的法律文化。作为案件的局外人,普通民众所接触之事实有限,加以专业知识缺乏,其话语立场必然呈现道德化,对案件的评价往往诉诸于基本情感与直觉。另一方面,法律事实与媒体所报道之事实并非同一概念。法律语境下的案件事实,是通过法定程序、依据证据规则对案件事实所作出的推断或认定;媒体所报道事实,则是具有传播价值的事实,是发布者对客观事实的主观认识加工后提供给受众的信息。在媒体业务失范的前提下,民众极易将通过文学渲染的新闻报道当作法律事实,并在此基础上做出建立于伦理道德基础上的价值判断,对案件的讨论亦逐渐偏离法律轨道。

三、舆论监督司法之制度构建

失去监督的权力必然滋生腐败,卸去羁束的自由则会导致社会秩序的毁灭。“鉴于司法和传媒所面临的实际情况,双方应该互相支持:司法要维护传媒自由,传媒也应该帮助司法摆脱一些羁绊”^①,关键是厘清二者分别的作用领域,保证其权力作用不过度膨胀,以至侵犯对方的生存空间。如前所述,目前我国的舆论监督与司法独立之间呈现出一定程度的失范状态,舆论监督对于司法领域侵入程度过大,某些社会关注度较高的案件,媒体审判挤占司法审判空间,司法过程屡为“民意”所掣肘,处境尴尬,迫切需要正视二者本质属性的差异,在此基础上设计舆论监督司法“合理范围与许可程度”之客观判断标准,并建立激励与约束双重操作性较强的机制,以期实现二者之间良性互动。以此为目标,

^①参见王好立、何海波:《“司法与传媒”学术研讨会讨论摘要》,《中国社会科学》1999年第5期。

舆论监督刑事司法的制度设计理应秉持的最低限度为：在肯定言论自由的前提下，当媒体报道与案件诉讼参与人基本权利、司法独立之间发生冲突时，应当优先保护后者。

1. 舆论监督之作用边界与规制。新闻自由具有三种功能：对话、制约与共信。^①我国并未出台《新闻法》《媒体传播法》等规范性文件对媒体刑事司法报道进行规制，自治性媒体联盟也无具体操作性的规则与罚则。目前法律规制框架下^②，舆论监督规制首先应当秉持以下原则。第一，合法性原则。媒体并非司法机关专业人员，其发言必须严格按照法律专业术语、判断标准进行，禁止向公众传递涉案当事人罪与非罪、此罪与彼罪、是否需要承担刑事责任等任何引导性论述。第二，平衡性原则。媒体报道刑事司法活动时，必须给予诉讼冲突各方平等的话语权，不允许就案件某一侧面进行渲染，须全面还原整个客观事实。第三，连续性原则。刑事司法活动具有阶段性、渐进性特点，任一刑事诉讼阶段均呈现阶段性、片面性特征，舆论监督应当对整个诉讼过程予以关注，及时、连续地对案件进行整体性报道，为公众呈现追求诉讼正义与实体正义的司法全景。第四，事实与评论区分原则。刑事司法报道禁止采用夹叙夹议之手法。任何一桩刑事案件审结之前，媒体所作出的评论性报道皆为违反职业规则与道德之行为。当然，对于客观事实层面的非评论性陈述，不做限制。在上述原则的指导下，针对舆论监督的实务操作，应当作出以下规制。第一，监督对象为法院公开审理案件。根据《刑事诉讼法》规定，涉及国家秘密、个人隐私、被告为未成年人等案件，均不公开审理。舆论监督应当严格遵守上述规定，对于上述案件，从侦查阶段伊始，任何人不得披露案件信息。具有法律专业素养的涉案律师更不能基于任何理由，出于任何目的在网络上散布关于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甚至受害人之任何信息。第二，监督期间贯穿刑事案件司法进程始终，言论自由权却应当在案件宣判后行使。任何一桩刑事案件均需历经侦查、起诉与审判程序才能尘埃落地。法庭确定裁判之前，法律事实尚未确定，控辩双方主张未经质证，法官对刑事被告罪与非罪、此罪与彼罪、罪行性质、社会危害性、人生危险性等综合独立判断尚未成型，该段期间应当禁止公众对案件进行倾向性分析与评论。第三，监督态度，应当严谨秉持无罪推定。“无罪推定”是文明法治国家所奉行的重要原则之一，也是犯罪嫌疑人与刑事被告享有的核心权利之一。涉案言论必须严格秉持中立立场，仅就案件客观事实进行严谨报道，不能将未经采纳的检察院起诉意见、未经证实的被告人供述、未经交叉质证确认的证人证言当作法律事实进行报道，更不得使用“罪行滔天”、“不死不足以平民愤”等预判性字眼对案件进行总结陈词。

2. 司法独立之作用环境与前提。司法独立是司法公正的前提，但是司法独立并不意味着司法专横与神秘主义。具有合理因素的司法独立应当建立于以下环境中。首先，刑事司法应对舆论监督之理念更新。自媒体迅速发展，将过去政府控制舆情的单向度流通变为混合型流通，必须适应形势发展需要，由对舆情的控制型转为对话型。正如贝卡里亚在《犯罪与刑罚》中指出的那样：“审判应当公开，以便使或许是社会唯一制约手段的舆论能够约束强力与欲望”。^③司法机关必须与媒体配合引导舆情、关键做到坦诚地与质疑者进行信息交换。另一方面，司法机关对案件信息的披露应当由被动型转为主动型。社会敏感大案要案发生后，一旦司法机构公布信息不及时，真空地带必然会导致多源信息侵入。失实信息形成规模后，司法机关往往需要付出数倍的高昂成本来正本清源，重塑司法公信力。因此，案件发生之初，司法机构必须掌握节点，主动发布权威信息，抢占信息源头，早讲事实，重讲态度、谨慎结论。总之，新媒体高度互动化、个性化和及时性的特征为司法工作者与公众充分沟通、消除误解提供了前所未有的契机，同时也倒逼司法部门从封闭执法理念中走出，实现与民互动，消除司法与

① 卜建林、焦洪昌等著：《传媒与司法》，北京：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出版社，2006年，第11页。

② 主要包括《宪法》、《民法》、《中国出版管理条例》、《中国新闻工作者职业道德准则》和《中国广播编辑记者职业道德准则》等。

③ [意]贝卡里亚：《论犯罪与刑罚》，黄风译，北京：中国法制出版社，2002年，第23页。

民众间的隔阂,客观意义上促进舆论监督与刑事司法独立的和谐发展。其次,刑事司法应对舆论监督之制度设计。尽快制定具有操作性的涉及新闻网络传播行为的系列法律法规。无可否认,新媒体正以不可小觑之力推动着我国司法建设进程,虚拟空间对现实世界施加着持久而有力的影响,要破解群体舆论裹挟司法的怪圈,唯一有效的方法是加快对新媒体监督司法行为的规制。只有设置场域,划定界限,才能引导公众提高媒体素养,在法律允许的范围内合理行使对司法的监督权,这是防止舆论监督越界干扰司法独立的根本之策。各项法律法规已经形成基本架构的前提下,通过司法信息公开来提升舆论监督的客观性与公正性,及时、有效、客观地将涉案信息向社会公众输出,以削减多源性非客观信息传播可能性,抢先一步抑制“媒体审判”,达到舆论监督与司法独立在一定层面上的契合。再次,刑事司法应对舆论监督之环节细化。一是建立完善的公安司法机关发言人制度。以侦查、提起公诉、刑事审判进程为节点,第一时间由侦查、检察、审判部门向公众发布信息。明确发言人职责、发布内容与禁止区域,保证发言的权威性、及时性、准确性。二是完善不公开审理制度,明确不公开审理案件的范畴,对于不属于不公开审理的案件,法院通过微博、微信等自媒体直播庭审过程是满足公众知情权、助力舆论合法监督、消除受众疑惑的良好方式,这种有效利用新媒体工具、变被动为主动的司法公开姿态是消除民众疑惑、摒绝不实信息传播的最佳路径选择。当然,直播庭审需要极大的素养自信、技术自信与应对突发事件备选方案的预先制定,必须建立适合于庭审直播的具体规则,保证庭审过程的流畅性与效率。三是建立报道推迟制度,当舆论关注某一未决案件达到对司法独立形成负面影响的程度时,在某一司法程序区域内,一律禁止报道。司法审判也必须在消除前述报道对公众已经形成影响的前提下方可进行,从而保证当事人接受公平审判的权利。四是确立媒体违规追责机制。针对媒体实施对刑事案件的错误报道、虚假报道等行为,应当从行业自律性惩处、民事制裁、刑事惩罚三方面进行规制,督促媒体报道遵循基本执业规则,成为舆论监督之有效载体。

(责任编辑:王永贵)

Supervision by Public Opinions, Trial by Media and Independence of Criminal Justice

LIU Chun-yuan

Abstract: At present, the public participation in judicial procedures has become increasingly popular and media reports on criminal cases more transparent. This has brought about a group of typical cases which showcase the tension between the supervision by public opinions and the independence of criminal justice from different perspectives. Due to the differences in their basic principles, the supervision by public opinions has long been in conflict with the independence of criminal justice, though they are both based on constitutional legitimacy and objective rationality. A good institutional design should strike a balance between them, which depends on adequate exploration in both theory and practice. To achieve this goal, it is necessary for us to analyze how the supervision by public opinions is alienated and why the trial executed by the media take shape in order to promote the judicial justice. On this basis, we have to work out good measures for building effective principles of the supervision by public opinions, defining the right position for those who are involved in the supervision, and ensuring the self-discipline of the supervisors. A good institutional framework where the public supervision can interact with judicial independence productively also lies in due understanding of the true meaning of the principle of judicial independence and the value of its procedures.

Key words: independence of criminal justice; supervision by public opinions; trial by media